

從 Robert Darnton 之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談新文化史結合歷史學與 人類學的研究取徑*

余芳珍**

摘 要

借鑑人類學研究取徑是新文化史的主要特色之一，Robert Darnton 之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一文尤為公認之經典作品。本文以此篇論文與 Darnton 往後將前作的方法論加以前景化之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為主要素材，將 Darnton 的方法論再次前景化，析論他運用哪些流派的人類學理論，以實踐其所揭櫫的研究目標：即

* 本文源自劉祥光師「社會文化史的概念與實際」課程中的啟發，首需感謝劉師之辛勤教誨；初稿曾獲國立政治大學「全校史學論文獎比賽」心得組第一名（2002年3月），二稿於「世界史經典名著研習營」（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主辦]，2002年7月6-14日）上宣讀，會中得到夏伯嘉院士與陳正國兩位師長的教正和鼓勵，特別是戴麗娟師在人類學方面的寶貴建議，以及學友葉毅均在部分引用資料上之協助和中肯的修改意見，評論人汪采燁的用心提問，謹此特致謝忱。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當時民眾「如何」思考事物，而不再只是描繪他們的想法 (how to thought, not merely what to thought)；並且進一步分析 Darnton 如何轉化這些理論，以及借鑑上述理論所可能產生的缺失。

關鍵詞：新文化史、Robert Darnton、The Great Cat Massacre、Clifford Geertz、Mary Douglas、象徵人類學、新結構人類學

一、前言

以研究法國近代文化史聞名的學者 Robert Darnton 之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一書，據作者所言，乃是其與人類學家 Clifford Geertz 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合開心態史 (histoire de mentalite) 課程後，受到後者理論影響下的產物，為一部借鑑人類學研究取徑的歷史學作品。¹其中“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²一文 (以下簡稱“Workers Revolt”) 尤被視為所謂「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 的經典之作。「新文化史」為美國學者 Lynn Hunt 所鑄造的詞彙，它的發展脈絡與歐美學界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反對下列兩種具有決定論傾向的史學流派之趨勢極其相關：其一是以物質和經濟因素作為歷史解釋基礎的馬克斯主義史學；³其二為法國年鑑學派 (the Annales School) 第三代史家 Pierre Chaunu 所提倡的系列史學 (histoire serielle) 之

¹ Robert Darnt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p. xiii.

²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p. 75-104.

³ 關於馬克斯主義史學的發展脈絡，可參考：Georg G. Iggers, *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78-94. 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Hanover: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23-174.



第三層次計量取徑。該取徑在第二代史家 Fernand Braudel 長久持續時段 (longue duree) 的史觀影響下，認為心態的轉變是經由長時段緩慢演化而成，故須以量化法探討心態史，由此才能展現心態之特質與變化。⁴

「新文化史」對於上述兩種史學流派的抗拒，可從較長遠的西方史學傳統發展作一說明。根據 Peter Burke 的看法，文化史作為歷史研究的分支始於十八世紀末期。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則出現以 Jacob Burckhardt 與 Johan Huizinga 為主的古典文化史 (classical cultural history)。古典文化史認為文化為菁英階級所專屬，而且是時代精神 (zeitgeist) 的展現，因此在強調文化的單一特質之際，否認多元文化的存在。⁵這樣的看法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產生極大的轉變。此一轉變可溯自一九六〇年代，運用人類學、符號學 (semiotics) 治史，將關注焦點從菁英轉移至大眾的研究取徑；⁶以及法國年鉴學派第四代以 Roger Chartier 及 Jacques Revel 為首，主張視心態為史事發展的首要決定因素，摒棄心態史僅是 Braudel 三層次結構中之「第三層次」的概念。也就是心態本身即具自主性，而非完全受制於第一層次之地理長時段，及第二層次之社會、經濟結構等，皆是「新文化史」產生

⁴ Lynn Hunt,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2. 英國史家 Peter Burke 對「新文化史」的興起亦有相同的看法。參見：Ewa Domanska 著，蔣竹山譯，〈歷史書寫的新視野：彼得·伯克訪談錄〉，《當代》，163 (2001)，頁28-33。楊豫、李霞、舒小昀，〈新文化史的興起——與劍橋大學彼得·伯克教授座談側記〉，《史學理論研究》，33 (2000)，頁143-150。Lynn Hunt 等人於十年後對新文化史的治學取向則有深刻的反思，見：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⁵ Peter Burke, “Origins of Cultural History,” &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22, 184-191.

⁶ Peter Burke,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pp. 189-190. Robert Darnton,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90), pp. 191-218.



的背景。⁷

因此，「新文化史」的呼聲涵括了文化本身具有多元性質，以及心態在歷史變遷過程中的主動位置等兩個特色。就本文所要討論的“Workers Revolt”一文而言，由於具有採借人類學理論來探究十八世紀一般大眾心態之特質，故被追認為「新文化史」的經典作品之一。⁸Darnton 本人在出版該文的二年之後，曾撰寫“History and Anthropology”一文⁹，將前作的方法論加以前景化（foreground）。本文即以此兩篇論文為主要素材，將 Darnton 的方法論再次前景化，析論他運用哪些學派的人類學理論，以實踐其所揭櫫的研究目標：即當時民眾「如何」思考事物，而不再只是描繪他們的想法

⁷ Lynn Hunt,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 7. 關於年鑑學派的心態史研究，參見：Peter Burke 著，江政寬譯，《法國史學革命：年鑑學派1929-89》（台北：麥田出版社，1997），頁36-40、93-99。不過，此處所揭櫫的年鑑學派轉向心態層面的文化史研究，主要是英美新文化史家對當今法國文化史研究發展脈絡之看法。年鑑中人如 Chartier 對於新文化史家視 Chaunu 的聲明為現今年鑑文化史的研究特色，並且藉由反對 Chaunu 來彰顯新文化史的地位不表贊同，認為如此一來既窄化年鑑文化史的發展源流，又誤解現今的法國研究動向。Chartier 指出當今法國年鑑的文化史研究並非僅如 Chaunu 所言，為系列史之第三層次計量取徑而已，“reading text”的議題亦為年鑑關注的焦點。參見：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8), pp. 95-96. 關於法國年鑑學者談自身學派的文化史發展脈絡，尚可參考：Roger Chartier,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Mentalite: A Dual Re-evaluation,”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Trans. by Lydia G. Cochrane, pp. 18-52. Francois Dosse, *New History in France: The Triumph of the Annales*. Trans by Peter V. Conroy, Jr.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 pp. 170-180.

⁸ Lynn Hunt, “Introduction: History, Culture, and Text,”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p. 12-13.

⁹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29-353.



(how to thought, not merely what to thought)；¹⁰並且進一步分析作者轉化這些理論之處，以及借鑑上述理論所可能產生的缺失。

二、內容概要與史料運用

Darnton 撰寫“Workers Revolt”的主要手法，是將十八世紀視為「他者」(otherness)來觀察。所謂「他者」，是為人類學式的歷史學研究取徑(anthropological mode of history)。該取徑意在破除西方自十八世紀啟蒙時代以來所盛行之直線性歷史觀，藉由分析為今人所難以理解的文本、儀式或行爲，試圖了解「另一種」文化的意涵，指出歐洲本身具有「多元」的非線性歷史。¹¹

“Workers Revolt”一文旨在探析十八世紀初巴黎一家印刷廠工人的集體殺貓行爲，背後所隱含之工人內心想法與世界觀。作者運用的史料為印刷工人 Nicolas Contat 在殺貓事件三十多年之後寫下的紀錄，文體屬於工人階級之自傳體裁。在大多數工匠(artisans)皆為文盲的情形下，由於工作所需，印刷與排字工人必須略微識字，因此該階級的工人便發展出獨特的寫作傳統，藉以發抒對生活的感懷。這類體裁通常包含下列兩種要素：以幽默或諷刺的角度表達工人艱困生活的哀傷，與如何使這類作品吸引更多印刷工人閱讀，使之廣為普及流傳的寫作技巧，所以敘述的故事內容勢必與原始事件不盡相同。¹²不過，史料的特出敘述風格正是作者著意之處。Darnton 不再企圖尋求事件之時、地、人等具體史實問題的答案，而是直接採用印

¹⁰ Robert Darnton, “Introductio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3.

¹¹ 關於運用人類學將歷史視為他者的研究取徑，可參考：Kirsten Hastrup 著，賈士薈譯，《他者的歷史：社會人類學與歷史製作》(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8)。

¹²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78.



刷工人的視角，以梳理他們對貓屠殺的詮釋，探究該階級是如何看待與描繪己身的生活處境。¹³

“Workers Revolt”開端為印刷工人悲慘生活的描述。由於學徒們（apprentice）難以忍受沈重的工作壓力及布爾喬亞階級（bourgeois）的清閒生活，因此學徒之一 Leveille 在夜半模仿貓叫，試圖擾亂師傅（master）的睡眠。師傅認為他們著了魔，於是命令學徒殺貓藉以去魔。師傅妻子事先警告他們不准殺害她的愛貓，但是牠卻是第一個犧牲者。¹⁴就學徒為何殺貓這一部分，文中首先討論當時學徒既勞累又缺乏生活保障的工作情形，運用之史料為與 Contat 紀錄的故事時間相近，於 1762 年創刊之瑞士報紙 STN（Societe typographique de Neuchatel）。¹⁵接下來則描繪工匠慶賀自身行業所舉辦之歡慶儀式（ceremony）。這類歡慶儀式本為基爾特（guild）所有成員共同參與，但十八世紀時，在師傅禁止 journeymen 參加的情形下，journeymen 便自行舉辦，歡慶儀式的內容也因此有所轉變。簡要而言，學徒晉升為 journeymen 的儀式是 journeymen 自組的歡慶儀式中最重要的部分。晉升者會獲得新名字，表示擁有新的身分，並且被同業中其他 journeymen 所認同，即從原本的階級關係轉變成夥伴關係；而晉升者亦會被灌輸誠信觀念，以表示對師傅等布爾喬亞階級之偽善態度的憎惡。¹⁶

作者進而從民俗傳說、迷信、諺語、民間醫學等著手，探尋歐洲近古以來之民間文化對貓的看法，梳理歐洲嘉年華節慶（carnival）期間的殺貓傳統所顯示之意涵。貓隱含著巫術的聯想，貓的出現會擾亂農漁民的收穫；貓耳或貓血可以驅病；女巫經常幻化成貓，對他人施以魔法，故將貓斷肢

¹³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42-343.

¹⁴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p.75-78.

¹⁵ *Ibid.*, pp. 79-83.

¹⁶ *Ibid.*, pp. 83-89.



是避免被巫術侵害的方式。就空間而言，「家屋」(household)是貓最易施展巫術之處，尤其是雇主的家，殺貓行為會使居住於該屋的家人蒙受厄運。另外，由於「性」是家居生活中最親暱的部份，因此貓亦包含性的隱喻，諸如生殖、女人、戴綠帽的丈夫等。於是十八世紀印刷舖學徒殺害師傅妻之家貓的行為便蘊藏多重意涵。¹⁷

就「巫術」而言，貓象徵師傅妻子，棒打她的愛貓表示視師傅妻子為女巫，殺害牠則意指對師傅妻子施以暴行。此外，由於貓和「家屋」的關聯，師傅妻子的愛貓過著備受寵愛、與師傅一家無異的舒適生活，學徒便藉著殺害牠表達對布爾喬亞階級的奢華生活與對學徒刻薄待遇的不滿，以及緬懷往昔師傅與學徒之間親如一家的氣氛。而貓又因為具有「性」的隱喻，殺貓連帶亦有暗示女性行為放蕩不貞，嘲諷師傅戴綠帽的意涵。在殺貓行為之後的連續數日，學徒以戲謔方式一再重演這齣事件。在這個類似嘉年華會的狂歡氣氛中，印刷舖轉換成劇場，屬於布爾喬亞階級的師傅與其妻子則成為學徒嘲弄的目標。¹⁸

三、借鑑人類學理論的前景化

學徒殺害師傅妻子之家貓，反映拉伯雷式(Rabelaisian)嘉年華的哄笑，而其中所隱含之心態是作者探討的重心。根據 Darnton 在“History and Anthropology”中闡釋“Workers Revolt”一文之寫作手法，筆者認為他分別運用了美國象徵人類學以及英國新結構人類學的理論。就象徵人類學(Symbolic Anthropology)而言，作者主要是借鑑 Geertz 之“thick description”的概念。¹⁹Geertz 將文化視為含有象徵與意義的系統(culture as a system of

¹⁷ Ibid., pp. 89-96.

¹⁸ Ibid., pp. 96-101.

¹⁹ Clifford Geertz, “Thick Description: Toward an Interpretative Theory of Cul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pp. 3-30. 中譯本可見：納日碧



symbols and meanings)。所謂「象徵」(symbol)意指意義的濃縮形式，但是「象徵」所包含的意義是多元流動的，並非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在不同的社群或情境之下，意義便隨之變動。以 Geertz 為主的象徵人類學派即在探討象徵與其所表示的各種意義之關係，試圖從觀察日常生活中人們的行為、語言、習俗等，發掘一般人的心態 (mentality)。²⁰在這個事件裡，作者藉由分析歐洲近古以來的民間文化，指出「貓」作為具有特殊力量的象徵，與其他缺乏特異力量的象徵相較，涵括更為豐富多重的指涉意義。

除了象徵人類學之外，作者亦運用新結構人類學的分類體系概念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析論何以某些象徵具有非凡異常的力量。根據法國結構人類學者 Claude Levi-Strauss 的看法，人類思維的特點在於類比 (analogy) 而非邏輯 (logic)，因此人類的思考模式為二元對立的分類體系 (binary oppositions)，二者的關係是既對立但又並列存在。人類把這種分類模式加諸於社會和自然事物上，進而對事物進行各種聯想。英國新結構人類學在吸收上述概念之際亦提出修正。該派學者 Edmund Leach 認為 Levi-Strauss 的二元對立模式之間須有一個非 A 非 B 的媒介，二元關係才能形成。此派另一位學者 Mary Douglas 則進一步指出，結構人類學的分析只能解釋人類跨文化的普同深層思維模式，卻無法解釋這些模式在現實社會

力戈等譯，〈深描 (Thick Description)：邁向文化的闡釋理論〉，《文化的解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頁3-36。此外，關於 Geertz 理論在新文化史的運用與侷限，可參考：Aletta Biersack, "Local Knowledge, Local History: Geertz and Beyond," in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pp. 72-96. Richard Biernacki, "Method and Metaphor after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pp. 62-92.

²⁰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30-331. Peter Burke, "Unity and Variety in Cultural History," *Varieties of Cultural History*, pp. 194-195. 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頁244-255。王氏此書部分篇章涉及所謂「學術規範」的問題，但本文所引用部分並未包含在內。筆者認為本書依然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生活中的互動關係。而深層思維模式之所以能夠存在，是因為其在社會生活中發揮著某種作用。以無法歸類於二元模式之非 A 非 B 物而言，它往往被社會定義為禁忌（taboo），擁有危險與不純的特質。然而，禁忌亦表示存在著將社會的秩序規範化之分類體系，使社會的各種事物有各自的位置，從而具備了維繫社會秩序的積極功能。²¹

作者運用 Douglas 的禁忌概念，指出師傅妻子之貓既具有野貓的獸性，但同時亦是居住在家中的寵物，享受著和人相同的生活，因此牠是一個介於人和動物、戶外與室內之間的媒介物。而貓象徵性，女性又通常被比喻為貓，具有相對於文化／理性的自然／非理性特質，故上述人和動物的對立可以代換為師傅妻子和野貓。相對於師傅妻子之家貓，學徒同樣也是非 A 非 B 的第三元。由於他們既不完全被舖裡其他成員視為一份子，但又因負責看守大門，可讓街頭工人入舖內做臨時工或應徵工作，故被街頭工人視他們為舖裡的成員；而且他們白日在外跑腿，晚上回舖就寢，所以學徒介於師傅與街頭工人、戶外與室內之間。因此這裡呈現出兩組分類體系，其一是師傅妻子——師傅妻子之家貓——野貓，其二是師傅——學徒——街頭工人。當師傅妻子之家貓侵犯學徒，跨越原本隸屬的分類體系，爭奪人的食物以及師傅的眷顧時，更加深了牠本來已經處於曖昧模糊位置的危險。在兩組分類體系呈現交疊的情形下，家貓和師傅家人位處近乎同等的地位，學徒便藉由殺害牠，表達對師傅（布爾喬亞階級）的不滿，以及對

²¹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36-341. 當然，Mary Douglas 在象徵人類學中亦有其地位，未可遽然加以排除。事實上，即使是同一位作者的討論，對 Douglas 的定位也不盡相同。參見：王銘銘，《文化格局與人的表述：當代西方人類學思潮評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頁48-51；王銘銘，《想像的異邦：社會與文化人類學散論》，頁224-232。本文之所以強調 Douglas 新結構人類學的背景，是由於 Darnton 採借的主要是她在這方面的學說。



於往昔印刷基爾特裡，學徒和師傅平等關係的懷念。²²此外，兩組分類體系亦以性別作為區隔，具有以自然／理性劃分女／男的意味，因此男性學徒殺貓，暗示以理性攻擊自然，除了有刻意以此建立學徒自身生存的正當性之外，更包涵了污辱師傅妻子，指責她是非理性一方、類同於貓的性猥褻意涵。

四、人類學理論的轉化與缺失

“Workers Revolt”分別採取新結構人類學 Douglas 的禁忌概念與象徵人類學 Geertz 的“thick description”概念，解析何以「貓」成為具有特異力量的象徵，以及人們在運用該象徵時，如何賦予它多重流動的意義，形成可以互相溝通、傳播訊息的體系。這兩個人類學派皆以揭示埋藏在人類行為背後的心態為目標，所不同的是新結構人類學分析象徵本身的意義，而且象徵與意義之間具有固定對應的關連；象徵人類學則著重於象徵與其涵括的多元意義之間的關係。換句話說，前者主張人類思維結構所具有的社會功能；後者則關注人類的表層行為，以及其所建構之網絡（web）所呈現的意涵，強調唯有體系內的成員才能理解象徵意義，在此情況下，不同的象徵體系（即文化）表達出不同的世界觀，深具地方性特色。²³

Geertz 的象徵體系反對馬克斯主義之經濟社會決定論，強調文化本身不但具備創造力（creativity）與動力（agency），亦且是一種具有凝聚性與一致性的封閉網絡。不過，也有學者對這個主張提出質疑，認為 Geertz 在探

²²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50-353.

²³ 關於文化的地方性特質，可參閱：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act and Law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pp. 167-234. 中譯本為：王海龍、張家瑄譯，〈地方性知識：從比較的觀點看事實與法律〉，《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頁222-322。



尋意義之際，忽略了衝突 (conflict) 與差異 (difference) 的一面。由於 Geertz 的研究取徑是從人的行為深究入內心深層心態，預含了行為與認知互為一體的假設。但是實際上，即使象徵體系內的人們接受彼此共享的意義，也並不表示他們在意識層面上會認同這個意義。即使認同，彼此也不一定會因為共享意義而形塑出和諧、凝聚的關係，敵人之間亦可能共處在同一個象徵體系。²⁴

就上述殺貓事件而言，師傅妻子面對自己的愛貓被學徒殺害時所說：「這些邪惡的人無法殺師傅，所以他們殺了我的貓……」（“These wicked men can't kill the masters, so they have killed my pussy……”）²⁵，表示師傅妻子能夠理解學徒殺貓行為的意義。也就是說，師傅妻子和學徒共處於同一象徵體系之中，雙方皆視貓為「家屋」的象徵，殺貓等於侵犯家屋內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布爾喬亞階級身分。而殺貓的另一象徵意義「性」，即藉由污辱師傅妻子來嘲弄戴綠帽的師傅，也因「家屋」予人「性」的聯想，而為師傅妻子所知悉。²⁶然而就師傅而言，師傅在面對妻子愛貓被殺時，僅說：「這些惡棍不好好工作，居然在殺貓。」（“Ah! The Scoundrels. Instead of working they are killing cats.”）²⁷換句話說，師傅對於上述的象徵意涵一無所知。²⁸而從他因為學徒學貓叫，便認為學徒被巫婆下魔咒一事，可知師傅

²⁴ William H. Sewell, Jr. “The Concept(s) of Culture,” in Victoria E. Bonnell and Lynn Hunt eds.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pp. 42-51.

²⁵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98.

²⁶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346-347.

²⁷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98.

²⁸ 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47-348.



對於貓的認知，僅只有「巫術」的象徵而已。

進一步地說，就「家屋」與「性」這兩個象徵意義而言，師傅妻子和學徒之間並未因共享意義，而形成一個高度凝聚性的象徵體系，雙方甚或可以說是處於敵對的狀態。而且師傅妻子對於愛貓死亡的憤怒，以及學徒當場力圖撇清與殺害家貓的關聯，和事後將之作為嘲諷布爾喬亞階級的表演素材，皆顯示雙方雖對象徵具有共同的認知，但是外在表現行為卻是截然相反的，內心認知與外在行為並非互為等同。因此這是一種非常鬆散的，而非如 Geertz 理論所說的緊密凝聚體系，亦即在共享的象徵認知下，卻加劇了體系內部的不和諧。

此外，作者未曾說明為何師傅妻子能夠理解「家屋」與「性」所代表的象徵體系，而師傅卻一無所知？也就是說，既然貓的多元象徵意義流傳於近古歐洲民間文化之中，那麼何以師傅在遭遇妻子愛貓被殺害之際，卻沒有如妻子一樣有相同的聯想？若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也就是貓的多元意涵只存在於民間文化當中來詮釋，則似乎無法圓融地解釋身為布爾喬亞階級的師傅妻子為何亦能理解這些意義。而若試圖從性別的角度來詮釋，那麼何以同樣身為男性的師傅，卻無法洞悉其中的性猥褻象徵意涵，反而是女性（師傅妻子）能夠立刻明瞭？簡言之，為何師傅對殺貓一事，僅有學徒不努力工作的抱怨而已？

因此，雖然作者關於象徵人類學的運用，主要在於指出同一象徵在一個社群體系中，具有多元流動的對應意涵，以及相異社群對同一象徵，會產生不同層次或性質的理解。關於殺貓一事，作者從社會背景的脈絡（context）統攝出貓在歐洲近古社會所具有的多重象徵意涵，再由這個廣大的象徵體系中，劃分出範圍較小的象徵體系，體系中的人共享著較大體系之象徵意涵其中一部分。不過，就小範圍的象徵體系而言，究竟是在何種情境下，象徵意義為體系內份子所共知？他們是如何對該象徵形成共識？以及何以體系外的其他人，出於什麼樣的社會背景因素，而為體系所排除，以致無法明瞭體系內的象徵意義等等，作者皆未對這些屬於脈絡式的問



題，提出進一步的分析。

另外，關於「貓」和「學徒」在各自隸屬的結構分類體系下，為非 A 非 B 的第三元媒介物，作者主要是借鑑 Douglas 的禁忌概念梳理而成。以「貓」而言，由於師傅妻子之家貓具有野生動物的本性，卻享受師傅一家人的關懷，佔據了學徒本應擁有的位置。因此作者從學徒的角度來看，牠這種因僭越而導致在分類體系中無法歸類的特質，是其為禁忌的原因。

不過，以「學徒」而言，作者並未因學徒和「貓」相同的第三元媒介特質，便明確地將之定義為禁忌。也就是說，作者在運用 Douglas 的分類體系對學徒進行解釋之餘，卻未對他們何以不具禁忌性質，做一清楚的說明。師傅妻子的家貓之第三元禁忌性質，主要是針對學徒所說的。那麼學徒之第三元非禁忌性質，是否因為學徒記錄為此一殺貓事件主要的史料來源，所以作者不得不加以遷就，從而難以找出將學徒視為禁忌的觀照角度？此外，Douglas 在指出非 A 非 B 第三元的禁忌涵義之外，亦認為它的存在具有穩定社會秩序的積極功能。但是在 Darnton 所分析的殺貓事件中，師傅妻子之家貓的存在，卻是造成學徒與師傅之間對立加劇的主要因素。師傅妻子豢養貓，並未讓印刷舖內的成員各安其位，知其本分，反而是學徒藉由殺害師傅妻子之貓以發抒憤怒，才穩固了即將鬆動的社會秩序。因此在這個事件中，禁忌是動亂的來源，唯有消滅禁忌，平和的社會秩序才會持續存在。

總而言之，在殺貓事件中，禁忌不再是穩定社會秩序的因子，反而與動亂有深厚的關係，作者既藉用 Douglas 理論，卻又不完全依照其邏輯來分析，此中緣由 Darnton 並未加以說明。此外，在象徵體系裡的成員是如何認知象徵所隱含的意涵，以及何以某些人會被排除在體系之外，亦是作者忽略之處。因此，在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形下，容易讓人產生作者是將二十世紀人類學理論套用在十八世紀史料之上的質疑，²⁹從而使得殺貓事

²⁹ Chartier 對 Darnton 借鑑人類學的手法提出質疑，主張應從人類學強調以當地人視角



件侷限於文本 (text) 分析，難以與社會背景的脈絡結合成緊密的對話關係。

五、「貓」的象徵意涵所呈現之嘉年狂歡意義

作者受到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之 *Rabelais and His World* 一書的影響，認為學徒對整齣殺貓事件所展現的拉伯雷式哄笑 (Rabelaisian laughter)，是一種屬於嘉年華會的狂歡。³⁰據巴赫金的研究，在嘉年華節慶裡，人們擺脫日常規範，取消一切等級，顛倒平日社會階級秩序，恣意對在上位者愚弄嘲笑。這個源自於古希臘的民間詼諧文化屬於民間通俗文化之底層，藉由頌揚平日被視為猥褻、卑賤的肉體低下部位，作為對於日常生活中神聖、抽象、精神性之事物的嘲弄，由此產生上下倒錯的戲謔效果。這不僅表示出毀滅與否定上層社會的權威地位，同時因為肉體低下部位具有生殖的功能，以及將之堂而皇之地公開弘揚，所以亦有再生、肯定民間價值觀的意涵。也就是說，人們藉由嘉年華會的慶典，表達民間文化之生生不息的世界觀。³¹

進行觀察之論點，遵循當時人（即十八世紀）對“symbol”與“sign”的定義以進行理解。不過有學者指出，Chartier 所指涉的十八世紀定義，是上層階級所賦予的。隨著階級或社群不同而產生相異理解的情形下，Chartier 試圖以上層階級的定義統攝工人階級的心態，並不十分妥當。相關討論參見：Roger Chartier, “Text, Symbols and Frenchness: Historical Uses of Symbolic Anthropology,” *Cultural History: Between Practices and Representations*, pp. 102-104. Jame Fernandez, “Historians Tell Tales: Of Cartesian Cats and Gallic Cockfights,”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0.1(1988), pp. 122-123. Dominick LaCapra, “Chartier, Darnton, and the Great Symbol Massacr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60.1(1988), pp. 100-101. Darnton 對於 Chartier 也有類似的反駁。Robert Darnton,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The Kiss of Lamourette: Reflections in Cultural History*, pp. 330.

³⁰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99.

³¹ 關於嘉年狂歡的雙重意義，可參考：Mikhail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by Helene Iswolsky (Indian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中譯本為 Mikhail Bakhtin



就殺貓事件而言，作者提出學徒利用貓的「家屋」與「性」之象徵，翻轉了師傅妻子布爾喬亞階級的崇高地位，但這僅僅說明了狂歡的負面消極意義，積極性的再生意涵則未予以討論。作者在文末曾說，學徒僅能運用意義曖昧的象徵表達不滿，表示當時的印刷工人認同自己的行業（craft）大過於階級。³²但是，當體系內不同階級之成員因共享相同象徵意涵，卻導致階級間產生更大的歧見，似乎揭示階級衝突在日常生活中是習以為常的。因此，筆者認為，學徒藉由隱晦的殺貓象徵意涵，來嘲弄師傅妻子及其布爾喬亞地位，在不會因此失去工作的前提下，得以釋放平日的不滿，避免因怨怒積累過深，而產生大規模暴動，擾亂社會運作常規。這一層意義，或許可以顯示出再生的意義。這雖然未必表達出如巴赫金所談的生生不息世界觀，但卻也穩固了日常社會的生活規律，使之能夠週而復始地順利運行，並且在三十年後，殺貓事件參與者之一亦書寫成文，企圖攬奪對該事件的詮釋權，這皆意味著再生意義對工人階級的深遠影響，是再生的另一種展現。

著，李兆林、夏忠憲譯，《拉伯雷研究》（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Mikhail Bakht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Folk Humor,” in Robert M. Adams trans. and ed., *The Praise of Folly and Other Writings: A New Translation with Critical Commentary* (New York: Norton, 1989), pp. 309-317. 劉康，《對話的喧聲：巴赫汀文化理論述評》（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5），頁261-336。此外，Burke 從人類學的角度談嘉年華的社會功能，指出嘉年華會其實是統治階級在固定時間內，刻意允許的社會安全閥讓民眾有合法管道宣洩對社會上不公之事的憤怒，因此是一種社會控制的手段，而非下層人民有意識的抗議行為。詳見：Peter Burke, “The World of Carnival,”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ldershot: Wildwood House, 1978), pp. 178-204.

³² Robert Darnton, “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ever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 p. 101.



六、結論

Darnton 之“Workers Revolt”一文的詮釋手法，主要是先掌握歐洲近古社會有關貓的多元象徵意義，由此梳理出學徒所理解的貓之象徵意涵；再從師傅妻子之貓的僭越行爲，導致學徒對牠懷著極大的憎惡感，藉此指出牠的禁忌特質，以及經由殺害牠所展現的十八世紀印刷工人之生活背景與心態。簡言之，作者借用了以共時性爲特色的英國新結構人類學與美國象徵人類學進行探討，然而「貓」在歷史時空中呈現出什麼樣的歷時性變化，亦是個值得關注、但缺乏討論的議題。

另外，該文在借用 Douglas 的新結構人類學，以釐清「貓」的禁忌意涵方面，對於何以禁忌不再如 Douglas 所言，是爲穩定社會秩序的因子，反而造成社會的不和諧，以及爲何同屬非 A 非 B 第三元媒介的學徒，卻沒有禁忌的意涵，皆是需要再加釐清之處。而在採用 Geertz 之象徵人類學方面，作者將 Geertz 理論加以轉化，表示象徵體系內的敵對成員之間，仍共同分享相同的象徵意涵，梳理出不同參與者因其所屬階級、性別等而產生不同層次或性質的理解。不過，關於「貓」這個多元流動的象徵意義，爲何僅在某一體系產生某種認知，而體系內成員又須具備何種理解背景，以及爲何某些人被排除在體系之外，仍需進一步探討。上述問題皆是 Darnton 未曾措心之處。

在「貓」具有多重流動的象徵意涵之下，貓屠殺事件所展現的嘉年華哄笑，不但有顛倒日常社會階級的意義，更讓工人階級在此事件中獲得再生的力量。不過綜而言之，雖然 Darnton 將二十世紀人類學理論套用在十八世紀史料之上的研究手法，恐怕有過於深化或窄化史料本身所呈現的意義，然而也正因爲有此缺失，才更值得討論，以作爲史學研究在跨學科研究取徑的風潮下，關於方法論的進一步反思。

